

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

汤显祖与牡丹亭

徐扶明



525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

汤显祖与牡丹亭

徐扶明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沪新登字 109 号

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

汤显祖与牡丹亭

徐扶明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.5 插页 3 字数 73,000

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000

ISBN 7-5325-1583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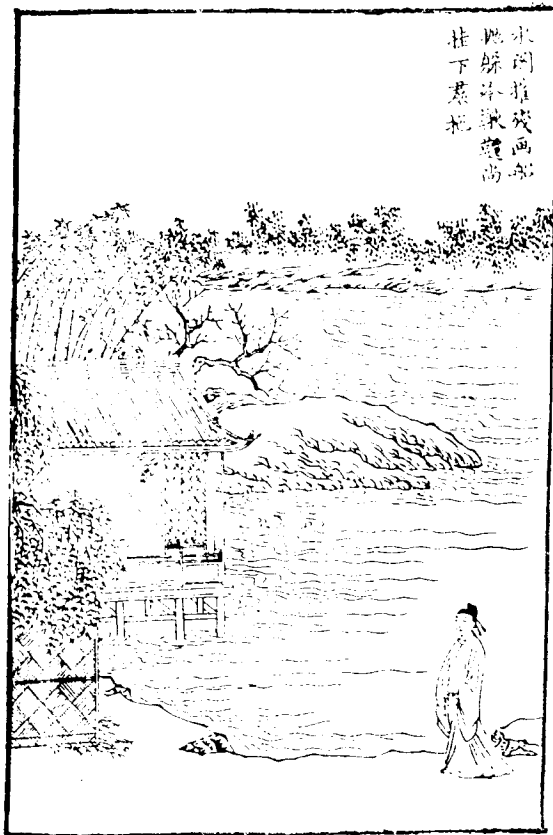
I·814 定价: 2.70元

王君為漢四百年丹書
 昔年羅縹緲使通江
 梁紀將燈塔此傳
 明川元為家臣望其
 外謝傳文相生昔人
 官不才天大國不怪
 一五古歌正於一凡
 無露滿傳其去與元
 語賦何句以人若作
 傳詩餘半山麓雪辭
 古



若士先生小像
 疏名成次知夏江都陳作樂批

水閣推殘
晚照
掛下
蕉花



目 次

一、汤显祖的生平·····	1
二、汤显祖生活的时代·····	19
三、汤显祖的文学理论·····	35
四、《牡丹亭》的创作过程·····	50
五、《牡丹亭》的主题思想·····	62
六、《牡丹亭》的艺术成就·····	75
七、《牡丹亭》改本概况·····	103
八、《牡丹亭》的流传与影响·····	117

一、汤显祖的生平

(一) 求学时期

明代杰出的文学家、戏剧家汤显祖，初字义，改字义仍，号海若，别号若士，晚年号茧翁，自署清远道人。嘉靖二十九年(1550)农历八月十四日出生于江西抚州临川县东门外文昌桥东汤家山(即灵芝园)祖居。汤诗《吾庐》云：“文昌通旧观，东井映余辉。出入桥梁望，郁葱佳气微。层台对金玉(按指金石台、玉石台)，限阡隐灵芝。”其故址在今抚州市东门外前太平街，文昌桥仍跨于抚河之上，而汤家祖居却已大变样了。

汤显祖出生于书香世家。祖父懋昭有文名，笃信老庄之学。父亲尚贤倾心儒学，“为文高古，举止端方”(《文昌汤氏宗谱》)。家中藏书数万册，为显祖治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他说：“家君恒督我以儒检，大父辄要我以仙游。”(《和大父游城西魏夫人坛故址诗序》)这对于显祖说来，各有影响，使他徜徉在“儒检”与“仙游”之间。

汤显祖幼时，长得很清秀，但体弱多病，格外

得到祖母的爱护。可是他很聪明，五岁就能属对，试之即应，屡试无难色。十多岁，从徐良傅学古文词；显祖早年以《文选》知名，正得力于这位启蒙的文学老师。他说自己少好“古文诗，未知其法。弱冠始读《文选》，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，亦无从受其法也。规模步趋，久而思路若有通焉。年已三十、四十矣”。（《与陆景邨》）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，在从姑山讲学，汤显祖、帅机等人，从学“修身为本”之学。显祖说：“一生疏脱，然幼得于明德（汝芳）师。”（《答邹宾川》）可见，他的思想亦受其影响。

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显祖年十四，补县诸生，每试必名列前茅。“帖括之外，已能为古文词；五经而外，读诸史百家”（邹迪光《临川汤先生传》），虽喜韵语，但“时为举子业所夺，心散而不精”（《答张梦泽》）。这是由于，他父亲以儒家思想严格教育他，迫切希望儿子读书应试，登第出仕，因为这在当时被视为知识分子通常所走的正途。

隆庆四年（1570）秋，汤显祖年二十一，中江西乡试第八名举人。“乡举后，乃工韵语”（《答张梦泽》），能精乐府歌行、五七言诗。今存《红泉逸草》，证实他青年时在传统的五七言诗方面，曾受过良好的训练。此外，他还兼通地理、河籍、墨、兵诸书，涉猎的学问范围更加广泛了。

隆庆五年(1571)、万历二年(1574),汤显祖先后两次赴北京应春试,均不第。适值余有丁为南京国子监祭酒,显祖就在南京国子监读书。万历四年(1576),访友人宣城令姜奇方,与梅鼎祚、沈懋学订交,饮宴赋诗,谈兵说剑,兴致豪放。据汤显祖说,梅鼎祚向他提出:“文赋可通于时,律多累气。”(《答费学卿》)因此,他开始着力写律诗,纪游言怀。此后,他与梅鼎祚交情日益深厚,陆续写了《寄宣城梅禹金》、《招梅生篇》、《戏赠梅禹金》诸诗篇。

万历五年,汤显祖和沈懋学同往北京会试。这时,宰相张居正欲其子及第,物色海内名士,作为陪衬,闻显祖、懋学名,命诸子延致。这是一般平庸之徒所渴望而不可得的,而显祖却不受张居正的笼络,谢不往。他鄙弃这种结纳权势而博取功名的不正当门径,显示了高尚气节。懋学遂与张居正子嗣修同及第,而显祖又落第了。他对这次会试营私舞弊、阻塞寒士的进取之路,当然很愤慨,说是:“谁道叶公能好龙,真龙下时惊叶公!”(《答荆州张孝廉》)他回家后,心烦意闷,“止有清夜秉烛而游,白日见人欲睡”(《龙君扬诗序》),作《广意赋》,自宽胸怀,实际上是倾泄怀才不遇的牢骚,意终未惬。

万历七年(1579),汤显祖又往南京国子监读

书，为张位所赏识。张位威望很高，也是江西人。显祖对这位老师很尊重，始终保持亲近。这一年，他把去年刻印的《问棘堂集》寄给徐渭（文长），请其评论。“文长自负高一世，少所许可，独注意汤义仍”（《万历野获编》），把自己诗集赠给显祖，并作《读问棘堂集诗》，有“执鞭今始慰生平”之句，称其“真奇才也”。可见他们相互倾慕，引为知己。

大约在万历五年到七年之间，汤显祖与友人吴拾芝、曾粤祥等人合作，取材于唐人小说《霍小玉传》，写成《紫箫记》传奇。但因“是非蜂起，讹言四方”，“实未成”（汤显祖《紫箫记题词》）。今存本三十四出，故事情节尚未结束，可证。吕天成《曲品》评此剧“琢句鲜美，炼白骈俪”。显祖《玉合记题词》提及《紫箫》，亦自谓有“秣长之累”。那末，此剧当与梅鼎祚《玉合记》传奇同属于骈绮派的剧作。这只是小试牛刀，初露锋芒而已。

万历八年（1580），汤显祖再往北京会试。宰相张居正第三子懋修与乡人王篆来结纳，以鼎甲相许，作为诱饵，而显祖婉谢不受，表示“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”（邹迪光《临川汤先生传》）。因此，他知道自己这科会试又无希望，就不参加会试而南下了。果然，张懋修及第，时人讥为“关节状元”。汤显祖本怀着凌云壮志，“视天下事数着可了”，“颇有区区之略，可以变化天下”（钱谦益《汤

遂昌显祖传》)。可是，从隆庆五年到本年，经历十年之久，他五次应试而不第，诚然是沉重的打击。他说：“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，为秀才业所消，复为屡上春官所消。”（《答余中丞》）又说：“数不第，展转顿挫，气力已减。”（《与陆景邳》）然而，这也使他对科举制度之弊，有着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，所以，在他日后所写的剧作中，犀利地给以揭露和抨击，甚至辛辣地嘲笑“状元能值几文来”！可见，他“终不能消此真气”（《与陆景邳》）。

万历十年（1582），汤显祖为应明年会试，由临川赴北京，路过杭州，正值姜奇方任杭州府同知，留住月余。姜迫他作“时文”（对当时科举考试所采用文体的通称，亦称制艺，即八股文），每一篇出，姜“必为之喷饭绝倒，夸其必传”（《寄姜守冲公子》）。诚然，他对制艺确实下过功夫。汤显祖《汤、许二会元制义点阅题词》云：“予弱冠举于乡，颇引先正钱、王之法，自异其伍。”汤宾尹《睡庵稿》云：“制义以来，能创为奇者，汤义仍一人而已。”可知，他不为八股文的条条框框所束缚，而能大胆地有所突破，以奇制胜。所以，人称他为当时举业八大家之一。

（二）任官时期

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，政局已起变化，张居正于

去年病死，张四维、申时行入阁，以张四维为首相。这次会试，汤显祖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。他见张居正诸子和依附居正的新贵，都因势败而遭殃，自叹曰：“假令予以依附起，不以依附败乎！”（邹迪光《临川汤先生传》）识者服其有先见之明。张四维的儿子甲征，申时行的儿子用懋、用嘉，都与显祖同举进士。张、申二相欲使其子致显祖于门下，许以馆选，显祖亦谢不往。因为在他看来，“雪白本自性，云清无俗娱”（《寄奉学士余公诗》）。他曾在南京国子监读书，喜爱其地山水人情，故自请除授南京太常寺博士，属七品官。从此，他踏上了坎坷艰难的仕途。

汤显祖任太常博士，只管礼乐祭祀，本是闲职，所以经常闭门不出，摊书万卷，乐在其中，每至深夜，犹吟声琅琅不辍。家人笑曰：“老博士何以为？”汤曰：“吾读吾书，不问博士与不博士也。”（邹迪光《临川汤先生传》）他爱好剧曲，不仅常看演出，而且自度曲。由于多暇，便对《紫箫记》加以删润，改名《紫钗记》，描写闺妇怨夫之情，备极苦态，但情节比较冗长，结构比较松散，曲文“犹带靡缛”。有时，他闲策蹇驴，探访雨花台、燕子矶诸名胜，寄情诗歌。有时，他往天妃宫、神乐观，谈道、点摘道书。有时，他去长干寺、天界寺，参加读经、讲经、印经之类的活动。可是，他绝不怀半刺，奔

走于高官贵人之门。这时，罗汝芳至南京，与汤显祖、焦竑等人，讲学于学城西小寺，谈性命之理。都人士亦多从之游，户履常满。

虽然汤显祖身在“闲局”为“冷官”，但他并非不问时局。当时江南水旱相继，瘟疫流行，他清醒地认识到“精华豪家取，害气疲民受”（《玉茗堂诗·疫》）。他对边防吃紧，明军溃败，也忧心忡忡，一再表示关怀和愤慨。他随时注视朝政得失，密切关心朋友宦途命运变化，每每禁不住与“少年郎吏”对时事投以讥弹，对那些擅权谋私的“诸老大臣”很不满。同乡刑部尚书舒化贻书显祖，劝其宜近老成人，不可接触少壮而居下位的好言事者。汤显祖复信则针锋相对：“明公以诸言事者多恶少，正恐诸言事者闻之，又未肯以诸大臣为善老耳。”（《答舒司寇》）明确地支持少壮派对朝政的讥弹，不为权势所屈。吏部文选司郎中司汝霖，曾任临川令，与显祖又有师生之谊，慕其才，将荐为吏部郎，但劝其与朝中掌铨选的大员改善关系。显祖回信婉辞，谢其盛情。在他看来，“况夫迹中轴者，不必尽人之才；游闲外者，未足定人之短”，“人各有章，偃仰澹淡、历落隐映者，此亦鄙人之章也”。（《与司吏部》）这种洁身自好、不卑不亢的态度，颇为难得。可是，当时明王朝考核官吏的“京察”，却给予汤显祖所谓“不谨”的罪名。

这时，王世贞任南京刑部右侍郎，王世懋任南京太常寺卿，与汤显祖同官其地，而且显祖为王世懋属下，世懋作公宴诗，显祖未酬答，因为显祖以文学主张不同，与王氏兄弟不相往还。众所周知，王世贞等人掀起复古运动，鼓吹“文必西汉，诗必盛唐，大历以后书勿读”（《明史·王世贞传》），一时士大夫及山人、词客、衲子、羽流，莫不奔走于王世贞门下。可是，在汤显祖看来，“汉、宋文章，各极其趣者，非可易而学也。学宋文不成，不失类鹜；学汉文不成，不止不成虎也”（《答王澹生》）。他对王世贞的文赋，各标出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、唐诗字面处，有人传于王世贞，世贞曰：“随之，汤生标涂吾文，他日有涂汤生文者。”（《答王澹生》）看来，汤显祖对王世贞剽窃汉唐诗文的复古文风，大为不满，故标涂其文，强烈地表示反对。王世贞反唇相讥，可见显祖又遭忌恨了。

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，汤显祖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。次年，迁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，正六品。又一年（1590），初会达观（紫柏）禅师于南京。显祖受记（又名受荊）于达观，名寸虚。达观欲说服显祖弃官出家，未成。这时，汤显祖虽未与李贽（百泉）见过面，但对李氏学说很钦慕。他说：“见以可上人（达观）之雄，听以李百泉之杰，寻其吐属，如获美剑。”（《答管东溟》）又说：“有李百泉先生者，

见其《焚书》，畸人也。”（《寄石楚阳荆州》）这是因为，达观以禅宗哲学批判程朱理学，以宗教道德抨击腐败政治；李贽尖锐批判假道学，猛烈反对封建礼教。所以，汤显祖敬其人，并受其思想影响。

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闰三月，言官借星变向神宗进谏，神宗反谕责科道诸臣“无一喙之忠”，“斥奸去逆”，只知“长奸酿乱”，“旁观避祸”，却时常“归过于上，市恩取誉”（《明实录》）。汤显祖见到这道谕旨，立即上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义正词严地指出：“皇上威福之柄，潜为辅臣申时行所移”，“时行柔而有欲，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”，如“八狗三羊”、“虾蟆给事”之流，“贿属附势”，“躐窃富贵”，邀功固宠，排斥异己，“此辈不知上恩，专感辅臣”。而言官丁此吕、万国钦、李时中等，先后弹劾时政，效“一喙之忠”反遭贬窜。有些言官之所以“噤无言之者”，正以此为戒，“恐失富贵也”。实际上，此疏也间接批评了神宗的昏聩不明。他上此疏，并非出于一时冲动，而是对朝政腐败，积愤已久，不得不发，一吐为快。

神宗阅此疏，大为震怒。首相申时行及其党羽，惶惶不安，或上疏乞休，或上书辩护。汤显祖明明是发愤言国事，抨击辅臣阻塞言路，而上谕竟指斥“汤显祖以南部为散局，不遂己志，敢假借国事，攻击元辅”（《明实录》）。其实，这不过是神宗

为自己和辅臣开脱罪责而已。然而显祖一疏，震惊朝野，“直声满天下”（冯梦桢《快雪堂集·与刘少司成》）。他终于得到所谓“从轻处了”的处分，就是降为广东徐闻县（雷州半岛最南端）小吏典史（排在县令、县丞、主簿之后的“四老爷”，不在编制正额之内）。许多朋友为他贬官而担心，而他却“夷然不屑，曰：‘吾生平梦浮丘、罗浮、擎雷、大蓬、葛洪母井、马伏波铜柱而不可得，得假一尉，了此夙愿，何必减陆贾使南粤哉！’”（邹迪光《临川汤先生传》）又说：“去岭南，如在金陵，清虚可以杀人，瘴疠可以活人，此中杀活之机，与界局何与耶！”（《寄帅惟审膳部》）这表明，他对宦海风险泰然处之。

这年秋天，汤显祖由临川出发，过大庾岭，入岭南。次年（1592）春季，经广州、澳门，辗转达徐闻。他在这次长途旅程中，游览了罗浮山诸名胜，看到了贾胡、洋货等新事物，会见了传教士利玛窦，增广了见闻，开拓了眼界，也有机会接触了民间生活。这一切，对于他日后写《牡丹亭》，大有益处。因为，岭南新生活不仅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，而且也大大有助于他创作思想的开拓。他到徐闻后，作为典史，执掌刑政，却也热心教育，重建贵生书院。“贵生”之义有二，一是劝人勿轻生，二是教人知礼义。他亲自对诸生讲学，“执理谭修，开发款启，日日津津不厌，诸弟子

执经问难靡虚日，户履常满，至廨舍隘不能容”（刘应秋《徐闻县贵生书院记》），他“延引士类，海之南北从游者甚众”（《徐闻县志》）。这说明他对于发展徐闻教育事业，也曾有过贡献。
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，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。遂昌在浙江中部，万山丛中，最称僻瘠，赋寡民稀。汤显祖满怀政治热情，希望通过治理这个小县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。首先，他保持自身的廉洁，踏踏实实办事，这在当时贪污、腐败、浮夸成风的官场，诚然是难能可贵。他的政绩，主要有：一是重视治安，肃清“匪盗”，消灭虎患。二是提倡“农民之业”，大力劝农，推广耕种。三是清理隐占田产，按实征收逃税。四是建城垣、仓库，修明伦堂，创尊经阁，葺相圃学院。五是劝学兴教，日与青衿学子讲学质义，置学田，作为补助诸生之用。六是罢桁场，减科条，省期会。七是关心民瘼，为政“以清净理之”（《答李舜若观察》）。有讼者，劝导之，故讼日稀，五年中县无斗伤笞系而死者。对囚犯重在感化教育，除夕遣囚度岁，元宵放囚观灯，有病者贷以药。因此，很受百姓爱戴，“一时循吏声，为两浙冠”（邹迪光《临川汤先生传》）。当然，汤显祖的这些开明的政治措施，并没有超出儒家“仁政”的范围。在那个时代，深受“儒桢”熏陶的汤显祖，不可能在儒学思想之外，寻找